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刘森林 ● 主编



[英] 莱姆克(T. Lemke)等 ● 著

马克思与福柯

Marx et Foucault

陈元 等 ● 译

B565. 59/25

2007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

HERMES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刘森林 ● 主编



马克思与福柯

Marx et Foucault

[英] 莱姆克(T. Lemke)等 ● 著

陈元 等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与福柯 / (英) 莱姆克等著; 陈元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2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ISBN 978-7-5617-5574-7
I. 马… II. ①莱…②陈…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
②福柯(1926~1984)—哲学思想—研究 IV.
A81 B565.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1390 号



Marx et Foucault

Édition assurée par Sébastien Mordret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7-157 号

经典与解释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

马克思与福柯

(英) 莱姆克 等著

陈元 等译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7.75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5574-7 B·338

定 价 1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出版说明

贫瘠的园地造就贫瘠的思想，肥沃的园地孕育高深的思想。马克思的思想之花是在吸收了西方古今丰厚思想营养的基础上孕育和绽放的。许久以来，马克思主义有三个组成部分和三个理论来源的说法影响甚广，似乎马克思的思想根基主要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国民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理论相关，只要弄懂了这三种思想，就能确切把握“只有三个部分组成的思想体系”。这种看法无视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思想、基督教传统乃至 18 世纪末兴起的浪漫主义对马克思心灵的滋养。我们忘记了，马克思曾在标志性的“博士论文”中明言，自己要“联系整个希腊思想，详尽阐述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哲学”。在马克思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名言与特拉西及法国国立研究院主张的以社会科学启蒙民众、改造世界的激进思想之间，在德国早期浪漫派倡导的“存在先于意识”与马克思主张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之间，以及在马克思的一些思想与卢梭的一些思想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关联和类似。可以说，没有从古到今的众多思想的滋养和熏陶，仅靠三个来源是熏陶不出我们“熟知”的那个马克思的。

马克思进入汉语思想界已有百年之余,本土化的成果、实践,甚至与这种本土化同时发生并相互对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偏偏生养马克思的西方思想传统一直没有得到足够多的重视,其实,西方学界同仁在这个园地里的辛勤耕耘已经收获众多成果。理解一种思想,就要掌握和重建孕育了它的丰富资源,内心亏空和贫瘠的读者是难以读出作者通过文字表征出的诸多义涵的。马克思这位作者仍然在向当下的中国诉说,如果我们没有努力接近马克思的学术素养,尤其是欧洲的古典素养,我们不可能做一个合格的马克思的读者。

离开西方古典思想,离开西方传统思想,无法贴切地理解马克思。有鉴于此,在中山大学 985 二期创新基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明·现代文明的哲学基础”的资助下,在刘小枫教授的帮助下,我们组织翻译了这套“马克思与西方传统”系列,以马克思与古典思想的关系为主,兼及马克思与现当代思想的融通,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刘森林

2007 年 5 月 10 日晚于中山大学康乐园

前 言

正如马克思有好几个一样,福柯也有好几个,且彼此间有各种各样的特点。福柯所参照的马克思时而是有关一种模糊不清历史运动(或者一种《圣经》)的马克思,时而是写了很多东西,尤其是写了《资本论》的马克思。我们也可以通过阿尔都塞来认识福柯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理论背景。我们也可以通过法兰克福学派来认识他们之间的联系,这一学派是具有共同兴趣的团体。我们也可以从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出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把彼此联系在一起。

《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是二者相互影响的最有力的见证。在本书中,大型的国家机器,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经常被归之于纯粹的资本主义背景的监狱、学校、军营、医院和制造业。福柯并没有忘记强调他的惩罚(discipline)概念受到过《资本论》中对制造行业劳动的分析的启发。可是,我们必须想到,马克思在企业这样的理性的组织中看到了可代替商品秩序的初级形态,并把它的暴虐性格归罪于压在它身上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让大型的(生产、教育、卫生)机器摆脱商品的桎梏就是开启了解放的未来。然而,非常清楚的是,福柯从“惩罚”的角

度对这些机构予以了完全不同的解析。他从中发展出了一套特殊逻辑,并在整个“公民社会”中测试这一逻辑的传播。他没有把它的奴役人的特点归于资产阶级独一无二的特性,而是归于它本身的形式。这种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新的主观化的形式。他把现代社会科学与此形式联系在一起,就像同这些学科的起源之地联系在一起一样。虽然说他其中看到了一种即将出现(今天已经是主要)的秩序,但他所看到的东西完全是另外一种意义。他在其中发现了惩罚性的场所,这些场所从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激起了人们与之斗争的热情,这些新形式的斗争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所号召的斗争截然不同。

尽管福柯后来有了别的关注点,但这个问题体系在他的思想中一直是最主要的。《主体与权力》(“Le sujet et le pouvoir”)(《说与写》[*Dits et écrits*], IV, 1982, 第222页以及后面的几页)这篇文章就是最好的证明。在通过对过去几十年的研究之后,福柯指出了一种新形式的斗争的出现和发展。他说:“人们不再寻找‘头号敌人’,而是寻找眼前的敌人。另外,他们不认为解决自己问题的办法能存在于将来(即存在于解放、自由的诺言中,存在于阶级冲突的终结中)。与理论的解释的范围相比,或与使历史学家极端化的革命的范畴相比,这是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他明确指出,它们的基本特点是“对个体的身份提出质疑”,“抨击一切把个体孤立起来,把个体同其他人分开,搞乱集体生活,强迫个体自我封闭并剥夺他原来身份的东西”。这些斗争“把对与知识相连的权力效应的抵抗和能力及资格相对立”。这些斗争是针对知识特权的……它们“围绕着同样的问题:我们是谁?它们……是对决定我们身份的科学或行政的调查的拒绝”。他补充说道,对压迫和剥削的反抗从未停止过,但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是为了一种新的主观性而与奴役作斗争。

我们很清楚福柯的著作对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知道对那些今天声称不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人们所产生的吸引力。我们在此所介绍的这些材料并不是为了结束一场已经持续了几十年的辩论,因为这场辩论似乎刚刚开始。随着大量未发表的文章的面世,它将会如火如荼地继续下去。除了这种 19 世纪非常流行的,《知识考古学》中所提到过的推论形式之外,福柯的思想中一直活跃着一种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继承下来的隐性遗产,虽然不那么显而易见,但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外,福柯与阿尔都塞有近似之处,因为他们都喜欢用奴役、主观化和召唤这些术语来提出一些大同小异的问题。那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最初是通过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开始接受福柯的,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也会回顾他对意大利的理论和斗争运动的特殊影响。

莱姆克(Thomas Lemke)的出发点是福柯在 70 年代初于权力理论计划的开展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他对现代主体的自主性的幻想的批判似乎变成了一种关于不能自主的主体的简单学说。他的微观物理方法似乎没有办法描述国家机构的严密结构。他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关于权力是相对的和技术的现象,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把主体的(主观化的过程的)问题与国家的问题放在一起思考。他在规治的概念中找到了解决办法,这一规治之事建立在“行为”的概念之上,而行为则是双重意义的:自我的行为和人民的行为。莱姆克指出了福柯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开展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批判的,这一批判与今天声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遥相呼应。

勒格朗(Stéphane Legrand)也提议发掘被福柯“遗忘的马克思主义”。他对《规训与惩罚》中那些模棱两可的概念表示怀疑,他尤其疑惑的是不同惩罚机构的假设存在的同质性,这些机

构在此书中被放到了同一层次上。实际上,劳动确实在资本主义手工制造业中占据着中心位置,因为“惩罚”最终是针对它的,就像作者认为惩罚是锤炼“有用”之身那样,这种有用指的是能获得利润。1973年在法兰西学院举办的那些讲座带有更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的背景。我们可以在那些讲座中看到,如果要正确理解福柯那些概念和论点的政治与批判含义,我们就必须考虑上述背景。

勒布朗(Guillaume Le Blanc)建议通过阐述福柯与阿尔都塞之间的关系进而达到分析福柯与马克思之间关系的目的。他一方面把前面两人关于标准和惩罚的概念进行比较,另一方面把他们每个人关于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概念进行对照。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被引向奴役的问题。但是主体如何会同意被奴役呢?无论是福柯的唯名论还是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式学说,在这一点上都走进了死胡同。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书《权力的精神生活》(*La vie psychique du pouvoir*)对两位哲学家予以了新的诠释,此著作是我们在此进行深入探讨的指南和出发点。

蒙塔格(Warren Montag)也引用了阿尔都塞的一段文字。他指的是后者1963年关于解构主义、《疯癫与非理性》(*Folie et déraison*)作过的一次报告。阿尔都塞将福柯的分析与胡塞尔和尼采的分析相区别:福柯认为理论深刻地影响着压迫行为的必要性,文化是通过这些行为而形成的。当胡塞尔宣称要遗忘和掩盖起源之时,尼采却宣称要毁灭起源。据阿尔都塞所言,福柯的作品尽管在根本上摆脱不了先验论的色彩,但却开辟了这样的道路,即可以在不用考虑起源的情况下对历史进行思考的可能性。

杰索普(Bob Jessop)让我们认识了另外一名论福柯与马克

思之间区别的大家：1968年后的普兰查斯(Poulantzas)。他和同时代的福柯一样试图寻找一个关于把微观基础与宏观社会的战略方法联系在一起的权力的概念。普兰查斯借用了福柯在《规训与惩罚》和《知识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中的概念，并在他的《国家、权力、社会主义》(*L'État, le pouvoir, le socialisme*)中对福柯提出了批评。但矛盾的是，1976年后的福柯似乎间接地回应了这些批评。杰索普在辨别他们的异同，但尤其想寻找一个可以代替他们俩的共同问题的方法，这个问题就是微观多样性和宏观必要性之间的关系。福柯强调前者，而普兰查斯强调后者。

贾科梅利(Marco Enrico Giacomelli)的贡献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领域，即在50—70年代的意大利并在受马克思主义文化影响的背景下的社会学的、战斗的和理论的活动领域。这些活动受到过福柯研究的启迪。在这方面，工运主义(*opéraïsme*)的历史就是最典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柯预见了社会学和工运主义实践的发展。它们在福柯那里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语言和规范。

作为附加资料的部分提供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起源的，另一篇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的。还有一篇精彩的哲学论文和一篇经济学家在一场辩论中的发言。

比诺什(Bertrand Binoche)在“自由主义学说”之初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提出了两个不同的原理。第一个原理首先是用宗教术语表述的，并且在一些方面明显受到洛克和古德温(Godwin)的影响，它就是最小政府的原理，根据这一原理，国家应该让个体来完成他最擅长的事情。第二个原理首先得到过孟德斯鸠的说明，这就是差异政府的原理，根据这一原理，自由只有在

那些有好几种异质的体系同时发挥作用的地方才是可能的:法律、习俗等等。从19世纪初开始算起,被称作“自由主义”的东西诞生于这两个要求的相遇之中。于是,“新自由主义”,也就是在经济交流这唯一尺度制约之下的一切行为的升华,不再作为对自由主义的否定,而是作为对它的完成而出现。

哈里比(Jean-Marie Harribey)直接采用了从内格里(T. Negri)那里继承下来的“认知资本主义”的论点,根据这一论点,建立在现代技术、信息和认知革命基础上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导致了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怀疑。提出生产率提高导致价值下降不能成为反对马克思的一种论据;相反,这只是表述这一论点,也是马克思本人的论点的另外一种方式而已。价值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它的彻底消失。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它不可能使这样的思想产生任何动摇,即利润来源于对劳动力的剥削。这一危机是财富与价值之间的分离造成的,或者说,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那样,是知识生产的社会化和它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造成的。

埃尔登(Stuart Elden)介绍了列斐伏尔(Lefebvre)的思想从他1991年去世以来在法国的传播情况,尤其介绍了他的著作的再版的计划,这一计划已经面世好几年了。他对作者的一生进行了概述,并把他重新放到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来审视,为读者揭示了几个被今天的学术界忽视的方面。他对不同的诠释,尤其是埃斯(Rémi Hess)和特勒比奇(Michel Trebitsch)所作的诠释进行了比较。

“书籍”一栏着重介绍了列斐伏尔。

《现代马克思杂志》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 80 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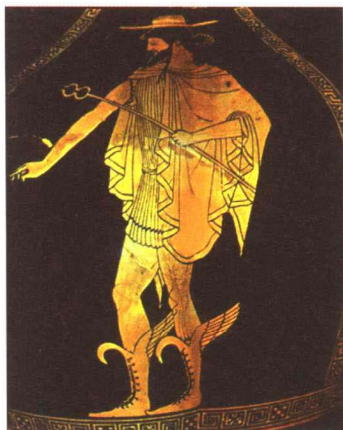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赓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目 录

“马克思与西方传统”出版说明(刘森林) / 1

前言 / 1

不带引号的马克思

——福柯、规训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 1

被福柯忽略的马克思主义 / 18

臣服:阿尔都塞、福柯、巴特勒 / 37

福柯与起源问题

——阿尔都塞读《疯癫与非理性》 / 58

普兰查斯与福柯笔下的权力与战略 / 87

福柯主义在意大利的前辈与后人

——工运中心主义透视 / 109

自由主义的两个原则 / 125

认知主义,新社会还是理论与政治的死胡同? / 157

列斐伏尔生命的延续 / 191

著作简介 / 214

莱姆克(Thomas Lemke)

不带引号的马克思

——福柯、规治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①

陈 元 译

即使人们承认马克思主义现在已经消亡,但它将来某一天肯定会复活。我所希望做的……不完全是为一种真正的马克思平反昭雪,但肯定是为了把马克思的教条中解放出来并还其本来面目,因为这种教条长期以来打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幌子而将其禁锢并僵化。(1994a, 第 457 页)^②

① [译按]中文据法译文译出。

② [译按]“1994a”指本篇参考文献中的“FOUCAULT M. [1994a],《Structuralisme et poststructuralisme》”。在本书中,凡不出现作者的引用标识,均指各篇参考文献中福柯本人的相应作品。

福柯与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①但必须承认,福柯在自己的著作中真正谈论马克思的地方并不多。即使在这些著作中,对马克思的评论也是轻描淡写。事实上,福柯对自己与马克思的关系描写得最精彩的部分位于他在面对采访或在论坛中对所提出的问题的反应中。另外,福柯的某些宣言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与马克思的某种立场是有一定距离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与福柯的理论导向没有任何直接的关联性。

可是,最终得出另外一种结论是完全可能的。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曾经写道,福柯著作的特点就是与马克思展开的一场“实战”(1989,第55页),这种斗争似乎是他的生产力的主要源泉之一。^②据巴里巴尔说,福柯的立场在其理论形成过程中经历了从与作为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决裂过渡到一种通过使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概念,至少是一些与马克思主义相符的概念的“策略上的联姻”的变化。我将顺着巴里巴尔的推理,更深入地了解他的重要的概念之一,即规治(gouvernementalité)的概念。但同时,我并不认同巴里巴尔的这种说法,即他肯定说马克思与福柯之间的差异是后者赞同一种“身体唯物主义”造成的。实际上,巴里巴尔并没有考虑到福柯作品中的重要的理论演变,特别是在《知识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1976)出版之后的变化。这些演变促生了关于治理(gouvernement)的问题体系,这一体系比巴里巴尔所认为的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视点。

① 有一些段落包括对先前出版的文章的重新加工(请看莱姆克 2002)。[译按]“莱姆克 2002”指本篇参考文献中的“LEMKE T. [2002],《Foucault, Governmentality, and Critique》”。在本书中,凡此类带作者名的引用标识,均指各篇参考文献中该作者的相应作品。

② 同样,Alessandro Fontana 和 Mauro Bertani 看到了一种“不间断的对话”(1999,第250页);Roberto Nigro 则认为是一种与马克思的“较量和战斗”,处于福柯作品的中心部分(2001,第433页)。